

# 国际礼品卡为何沦为非法换汇工具

《经济参考报》 兰天鸣

当前,国际礼品卡在国内互联网上持续热销。由于其常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售卖,广受国内消费者青睐。不过,由于具有匿名性等特点,国际礼品卡在一些案件中沦为犯罪嫌疑人非法汇兑和洗钱的工具。

多方建议,进一步加强国内网络平台国际礼品卡交易监管,加强对以国际礼品卡为媒介的违法犯罪打击治理,为合法合规买卖、使用国际礼品卡设置“红绿灯”。

## 一团伙利用国际礼品卡非法汇兑超20亿元

近期,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破获一起利用国际礼品卡非法换汇案,抓获犯罪嫌疑人50余名,查获一批涉案账户。

“此前,我们在针对一些疑似为赌诈等上游犯罪非法转移资金的账户进行分析时发现,有人的银行账户交易体量巨大,资金流水复杂,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办案人员说。

办案人员还透露,犯罪嫌疑人高某注册了多家网络科技公司并关联了数个网络店铺。这些网店都以售卖国际礼品卡为主营业务,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销售额竟超1亿元人民币。

犯罪嫌疑人高某等人组织人员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注册大量账户,并在换汇主题评论区内向潜在“客户”发送某国货币谐音的黑话。该团伙通过搭建境外专用App,以支付外币的方式,从外籍人员处收购以美元计价的国际礼品卡,并通过网店向国内需求者低价售卖国际礼品卡获得人民币。

扣除“手续费”后,犯罪团伙控制境内外的银行账户,完成境内资金池与境外资金池对敲,最终实现“外币—礼品卡—人民币”的非法资金汇兑。

办案人员介绍,外籍人员在境外购买国际礼品卡后,犯罪团伙多以面值约8折

的价格在国内网店销售,通过赚取销售差价和汇率差获利。

“以国际礼品卡进行资金非法汇兑的链路存在追踪难度,易沦为洗钱工具。”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国际礼品卡的发行端和使用端均合法有效,涉嫌地下钱庄、洗钱等违法行为的易夹杂在礼品卡的购销环节之中。

据警方调查,不法分子为牟取不法利益,非法汇兑资金20余亿元,从中非法获利1500余万元。

## 倒卖、使用国际礼品卡暗藏多种风险

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上看到,买卖国际礼品卡交易活跃。大量礼品卡的出售价格仅为面值的7折至8折。例如一张100美元的国际礼品卡,仅仅需要580元即可购买。有的商家的出售页面显示超过7000人购买过。

通过搜索“国际礼品卡”等关键词,搜索引擎首页即出现了“海外礼品卡充值商城”等网站,以及《购买国际礼品卡好做吗?揭秘国际礼品卡创业商机与成功之道》《不需要太多成本、不需要开店、即可开启回收国外礼品卡》等教学推广内容等。

“收得越多,赚得越多。100元面值的购物卡可从中获取差价30元,500元的礼品卡可获利160元。”一个自称已从事7年

国际礼品卡交易的用户向记者表示,其可协助有意从事该行业的人从境外网站购买国际礼品卡,并提供出售和回收国际礼品卡的卡商和工作室资源。

当记者询问是否存在违法风险时,该用户强调说:“国外礼品卡是不犯法且正规的,是一个具有持久盈利性的互联网项目,并非短期性的临时行为。”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上海)高级合伙人刘磊表示,当前国际礼品卡在国内存在多级批发的现象。“大卡商”常常将人民币非法兑换为外币,使用外币从境外购买大量礼品卡,之后批发给下游的小卡商。小卡商则通过电商平台零售给有需求的中国用户,从中赚取差价。

在刘磊看来,在境内倒卖国际礼品卡的行为存在行政违法甚至刑事犯罪风险。由于国际礼品卡并不记名,不排除卡片是通过洗钱、盗刷信用卡、诈骗等非法手段获取。倘若从境内“大卡商”处用人民币购卡的“小卡商”明知礼品卡是违法犯罪所得,却仍从事买卖工作,则可能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倘若明知和应当知道上游人员通过国际礼品卡非法从事本外币汇兑并从中赚取汇率差,“小卡商”则可能被认定为上游“大卡商”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从犯。

此外,国内购买国际礼品卡的部分需求者也遭遇了消费纠纷。“此前,我在电商平台上用700多元人民币购买了价值15000日元的境外购物平台礼品卡,商家说自家的礼品卡是正品。当我充值后,账号却被购物平台封禁。平台判定使用的礼品卡可能涉及欺诈、盗刷等手段获得的,除非我可以向平台提供个人购买凭证。”一名购买者说。

有多位购买者反映,自己在电商平台上购买境外游戏平台的礼品卡充值时发现,卡里的余额已经被使用过。与商家协商退款时,商家则以礼品卡一经出售概不退款、卡片可以使用等理由拒绝。

## 交易需设置“红绿灯”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国际礼品卡在国内销售和需求量巨大,需为其交易使用设置“红绿灯”。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主任严立新认为,国际礼品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一方面应加强对利用国际礼品卡从事非法汇兑等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应推动国际礼品卡在国内交易的规范化、阳光化,营造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建议,相关部门可对以外币充值的国际礼品卡等有价商品在国内以人民币结算销售的行为进一步加强研究,强化外汇、公安、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及时共享信息,联合开展专项行动,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涉国际礼品卡交易监管机制。

业内人士建议,根据最新颁布的反洗钱法,进一步落实落细国内电商平台和支付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建立健全交易者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例如,可对电商平台上架国际礼品卡的卖家要求填写礼品卡来源。对大量频繁交易国际礼品卡的买家和卖家,强制要求提供礼品卡来源凭证和用途去向,同时建立健全相关问题线索的移送机制。

刘磊表示,建议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相关法规,加强与重要贸易国家跨国结算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企业对外经贸走出去提供相关便利,为合法合规换汇“开正门、堵偏门”。

“购买者在使用和充值过程中,要保存好所有的交易凭证和聊天记录。一旦发现可疑交易或被骗,应当立即中止交易,并向平台客服或相关部门举报,寻求法律援助。”肖飒说。

# “带娃焦虑”:难遇难求育婴师

《半月谈》 王欢 王凯

记者近期调研发现,随着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不断追求,家政、月嫂、育婴师等群体供不应求。尤其是过去受重视程度不足的育婴师群体,如今越来越紧缺,有经验、富有亲和力的育婴师更是难遇、难求。



学员学习抚触婴儿的手法 王凯 摄

## 一人难求 金牌育婴师需求紧俏

在位于山东济南的衿如意月子会所培训学校,10多名新晋月嫂、育婴师正在接受为期约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在掌握婴幼儿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早期教育、心理疏导等专业知识后,他们将根据客户不同需求被安排到不同家庭。

“这几年育婴师的市场需求一直在稳步增长,技术熟练的育婴师更是供不应求,可以说是‘零空档期’。”衿如意月子会所董事长李霞说。

“公司刚刚开展育婴师业务时,很多育婴师都是小学文化程度,现在有5%左右是专科学历。”李霞说,在济南,普通育婴师到金牌育婴师的每月收入在6000元至1万元不等,高薪资吸引着高学历的年轻群体主动入行,这虽然尚未成为主流,但育婴师队伍的专业化趋势十分

明显。

市场需求紧俏,让育婴师这一职业成为“香饽饽”,薪资水平、学历要求等也水涨船高。

北京某互联网家政平台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上岗家政服务阿姨月平均工资为7964.8元。月嫂、育儿嫂、家务员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18876元、7552元、6559元,相较于3年前的平均工资分别实现26.8%、12.1%、14.7%的增长。

### 幼有优育 多因素催热“育儿经济”

“岗位职责:负责照顾小孩的饮食起居、启蒙教育等事项;任职资格:身体健康,年龄20岁至45岁之间,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一大早,衿如意月子会所的派单员李瑞娥就在“阿姨派单群”里忙碌起来,将当天的客户需求信息第一时间发给育婴师。

2024年55岁的李瑞娥是山东济南人,2012年起从事育婴师行业。“当时育婴师的月薪是2000多元,而且需求量很低,只有条件较好的家庭才会考虑聘请专业人员照顾孩子。现在每天在群里发布的月嫂、育婴师需求信息就有10多条。”李瑞娥说。

受访的家政服务从业者认为,随着“90后”“95后”逐渐成为育儿主体,育儿理念正从“幼有所育”升级到“幼有优育”,人们对于育儿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2024年7月北京市某机构发布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家长聘用月嫂、育婴师最重视的6个条件要求依次是道德品质、从业经验、专业技能、对孩子的接纳度、身体素质、年龄学历等。

河南漯河一家家政公司负责人表示,有一些客户很早就预约要求找育婴师,但有时候找了一个多月还找不到合适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育婴师不够,而是与雇主需求不匹配,是一种结构性短缺。

## 育儿无忧 需多举措破解“带娃焦虑”

部分受访人士认为,我国城镇居民面临“育儿难”“育儿贵”“育儿忧”三大难题,其中以“双职工”为代表的群体“育儿焦虑”尤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托育服务体系从家庭化走向社会化,面临供需不匹配、入托比例低、社区托育尚未形成主体等问题。

记者走访多家家政服务机构发现,月嫂、育儿嫂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家政服务员,需要掌握较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目前该职业群体存在就业歧视、入行门槛低、职业技能等级混乱等问题,导致整体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专业化程度不足,难以满足现代家庭育儿需求。

一些家政服务从业者表示,虽然月嫂、育婴师等职业的薪资待遇在不断攀升,但由于担心工作不体面、从业者权益保障不健全等原因,年轻人、高学历群体往往“敬而远之”,不愿踏足这一行业。

此外,社会机构托育功能不完善,是“带娃焦虑”难以破解的另一个原因。2021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鼓励用人单位创办托育托管服务设施。但由于场地限制、成本较高以及婴幼儿照料安全感问题等原因,托育机构受认可的程度较低。李霞等多位业内人士建议,从加大补贴力度等方面加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托育机构的普及度和利用率。此外,育儿涉及孩子的抚养、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在调整生育政策的同时,也应聚焦家庭实际困难,解决后顾之忧。